

试论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代 晓 冬

(四川理工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自贡 643000)

摘要:20世纪40年代初,张爱玲作为现代中国的第三代女作家的代表闪耀文坛,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是一个醒目的存在。她大胆地揭示出女性的心理痼疾,站在较高的层面对女性进行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所张扬的女性意识在她的手中得到了充实与丰满。

关键词:张爱玲;文学创作;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7)02-0082-05

20世纪40年代初,张爱玲作为现代中国第三代女作家的代表闪耀于文坛。1944年,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傅雷称她的《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1]62}。60年代初,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谈到:“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2]254}夏志清还称《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2]261}。杨义认为张爱玲具有鲜明的“才子+浪子”的真正艺术家品格,是“海派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3]453}。由此可以见得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身处动荡的时局中,在渐渐商品化和半殖民地化的沪港都市生活里,张爱玲的小说里没有左翼文化的影子。正如陈思和所言:“对于知识分子的那种忧世伤生的人文精神,张爱玲都回避了。”^{[4]351}无论是出于沦陷区特殊环境下的生存策略,还是个人的艺术旨趣,张爱玲创作的小说中表现出对世俗人

生、日常生活的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远远超过了其前辈作家。作为一个女性,张爱玲独立观察、体验着这个世界,渐渐磨练出了一双现代女性锐利的眼光。作为女性作家,女性意识如何在她们的创作上得以体现呢?“首先,她们在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考察时,格外注重女性的权益。其次,在创作内容上,较偏重于表现女性的体验、揭示女性的心灵、关注女性的命运、展现女性的生存状态。第三,其观察方式、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都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以上三点虽以不同的侧重方式呈现于女性作家的作品之中,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但这种意识必将会永存于女性文学之中”^{[5]157-159}。在自己的小说中,张爱玲关注女性问题,关心女性生存,倾其心力探讨描写女性生活,传达女性独立自主的理念。于青说:“如同丁玲的出现,是女性意识觉醒时代的必然一样,张爱玲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谁都不会忘记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史令人侧目的‘新女性’,然而谁也会在心底对不仅仅是女性文学的狂热时期的根基的虚弱暗暗摇头。然而,有一个作家在悄悄地做着许多热血作家所不曾注意的工作。张爱玲为女性文学掀开了女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页,她真实地掀开了黑夜里女性生活的残酷画面。在中

收稿日期:2006-07-18

作者简介:代晓冬(1965—),男,四川隆昌人,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国女性作家里,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那样以对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去孜孜于女性凄惨、悲凉的命运的书写。”^[6]⁴⁶⁸⁻⁴⁶⁹因此可以说,在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自觉。

一

我们从张爱玲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童言无忌》、《私语》中可知,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等多种原因,她的女性意识的萌发是极早的。

在张爱玲的童年世界里,母亲对她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由于母亲容貌出众,风度翩翩,这令幼小的张爱玲十分羡慕,盼望自己尽快长大做一个像母亲这样美丽高雅的女人。于是她迫不急待地向母亲宣告:“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7]⁸⁸这是幼小的张爱玲对女性秀雅丰韵的独特发现和一份自觉追求。但家中女佣重男轻女的态度和行事方式,给年幼的张爱玲带来了一份沉重的刺激:负责照料张爱玲的女佣叫何干,负责照料弟弟的女佣叫张干,按旧式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的地位自然要比女孩子尊贵,所以张干也自觉身份高于何干,凡事处处占先,给何干闲气受。张爱玲有时去找张干理论,却被她抢白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8]¹⁰¹言外之意是让张爱玲明白,女孩子在家中是没有地位的,将来这家是属于弟弟而不是她。这种封建旧家庭性别歧视的压力,就使她从小便萌生了要为自己和天下的女人争取正当权利和人格尊严的渴望与信念。她后来曾在散文《私语》中写道:“张干使我很早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8]¹⁰¹

另外,张爱玲后来的成长环境和受教育的背景也对她的女性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张爱玲出生并成长在上海,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特殊的历史背景、洋场租界的身份,注定了其文化的庞杂性和交汇性:古老的封建文化和现代文明在这里交战、并存,中国的民族文化和西方的外来思潮在这里碰撞、融合,种种处于不同历史时空的价值观念、伦理精神都可以在这里“和平共处”,呈现出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两栖性,这是洋场社会都市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加之张爱玲中学就读于

圣玛丽亚女校,这是上海著名的美国教会女子中学,不但授课方式新颖,思想也较开放活跃,这就使张爱玲较之同龄人能更早地接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让原本就存在的朦胧的女性意识进一步明晰化。中学毕业后张爱玲离沪赴港进入香港大学文学系学习,在香港这个准西方化的学习环境,她更有机会直接接触到西方世界里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思想,耳濡目染之中无疑进一步强化和固置了她的独立自存的女性意识。

二

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她对女性的命运、生存真相、自身的缺陷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正是这种清醒的女性意识,张爱玲把自己的女性身份、爱好和细致感受,全部带进了创作当中。她的小说和散文展示出的,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女性世界。她的创作题材大多取自身边琐事,而这些琐事也正好组成了女人有着特别爱好的生活内容。乔以钢认为:“从女性的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的角度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9]¹⁰⁵

五四以来的作家着力表现中国女性在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下的悲苦与不幸、觉醒与反抗,多从社会方面去寻找女性不幸与痛苦的根源。五四女性文学常把战斗的锋芒指向整个封建社会。女作家们具有较强的社会使命,她们的作品大都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闪烁着批判的光芒。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通常描写革命的女性和女性的革命,更是和社会革命紧密相连。因此,表现时代灵魂、民族精神和革命情怀成为这些女作家共同的审美心理趋势。与五四以来其他女作家不同,张爱玲颇具自审的眼光,多从女性深层心理结构上去挖掘女性自身的痼疾及其文化根源。将女性深层的传统意识和心理痼疾予以挖掘、展露,以此来探索女性不幸的根源是张爱玲独特的视角。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连环套》里的雅赫雅不过是个中等的绸缎店主,得自己上柜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够同他相安无事,不难一直相安下去,白头偕老也无不可。他们同居生活的失败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10]⁷⁵作为女性,张

爱玲不是掩饰女性的缺点,而是以敏锐的眼光去剖析女性自身,真实地指出由于女性自身的缺陷而造成的种种不幸。

张爱玲对女性的自审的最重要内容是对母性的自审。在20世纪初“人的觉醒”的过程中,代际冲突主要体现为父子冲突,母亲常常被描写成好意而无能的角色,子女的反叛往往是针对封建家长制的体现者父亲,母亲则是温柔慈善、富有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形象,这一特点在冰心、丁玲的作品中有体现。可以说张爱玲是对母性自审的第一人。

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两类母亲形象,一类以《金锁记》^[11]中的曹七巧为代表,她们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与统治欲;另一类以《鸿鸾禧》^[11]中的娄太太为代表。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原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角色,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旁人,随他们的思想滚动而滚动。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曾经有过美妙的青春,但她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代行父权的兄长把她嫁给残废的贵公子,她的一生就这样被贪图富贵的兄嫂狠毒地葬送了。一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闯入宦宦世家,卑贱的门第永远是她的耻辱,父权、族权、门第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她在无爱的婚姻中侵蚀了自己的青春。为了自卫和报复,她以母亲“保护”儿女为借口,对每一个闯入他们生活圈子的人都充满敌意。对儿子长白,她是出于传宗接代的考虑才让他娶了妻,一旦添了孙子,她便将儿媳虐待至死,令儿子再也不敢娶妻。对女儿长安,因为不存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顾虑,她便断然用极端的手段破坏女儿的婚姻,令女儿断了结婚的念头,终生为她所占。在这里,母亲失去了以往“博爱、圣洁”的特征,她的温馨与甜美完全让位于私利与报复,将对父权制社会的仇恨释放在子女身上,不择对象地用子女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自己的不幸。

《花凋》^[11]中,因为怕证实自己存有私藏,川娥的母亲宁可贻误女儿的病也不肯出钱为她求医。《半生缘》^[11]中曼桢的母亲由于糊涂和私心,竟然默许禽兽一般的曼璐夫妇蹂躏、幽闭孝顺又上进的女儿,还在她的男友寻找她时隐瞒实情,做了帮凶。《沉香屑·第二炉香》^[11]中,蜜秋儿太太因为自己是个寡妇,便对女儿们实行禁欲主义教育,间接谋杀了

她们的丈夫,“制造”了新寡妇。在《倾城之恋》^[11]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受到哥嫂压迫而向母亲寻求安慰时,母亲却让她回婆家,过继个儿子,为死去的已离婚的丈夫守节。

《鸿鸾禧》中的娄太太在家族中一向处于难堪的地位。尽管娄太太要故意当着人欺凌娄先生,却能够看出这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独生子的婚礼她是插不上手,拿不了主意,可以做的只是为儿媳做花鞋,并且还被家人耻笑。对儿女的事情她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她不知该如何去帮助、关怀她们,因为丈夫的思想行为早代替了她的行为思想。她能够做的只有遵循,即她早已放弃了女性主体意识。

实际上不管是曹七巧还是娄太太,都是丧失了“母性”的女人。她们被男权社会彻底异化,走不出男人的阴影,最终的结局不是被父权所异化,就是始终处于没有归宿的愤懑和痛苦之中,要么永远沉默,一如没有存在过似的,要么如火山爆发般的邪恶力量伤害周围的亲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张爱玲解构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形象,颠覆母亲神话,把解剖刀切入母性深层,揭示出母性,继而揭出女性、人性的负面。

三

张爱玲又反对把女性的一切不幸都推之于男子,“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征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11]。也就是说,张爱玲认为女性的群体悲剧,也应该从自身去找原因。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通过对一个个女性婚恋生活中的不幸和她们自身却安于这种不幸而不思反抗的悲凉故事,来寄寓自己深刻清醒的女性意识——对“女奴”灵魂的痛苦拷问和对民族文化心理的痛切反思,其间蕴含着对生活在现代的女性思想中依然积淀着的传统封建思想意识的深刻批判。

在她的笔下,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赖心理。旧派女性没有自觉,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和保护安稳生活的唯一手段和最终归属。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物质文明,但仍然固守着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

思想意识。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通过离婚摆脱了虐待她的第一个丈夫,重新回到了主持这一痛苦婚姻的大家庭,终日被“破落户”兄嫂冷嘲热讽着,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下,她发觉了自己残留的资本——30岁左右的青春。于是,在万盏灯火的夜晚,在咿咿呀呀的胡琴声中,流苏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投向了范柳原这个有经济条件又“欣赏”她的稳妥靠山,和“狡猾精刮”的华侨子弟柳原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追逐婚姻的戏。流苏使出浑身的小智小慧仍不能够得到柳原扎实的婚姻保障时,也曾想出去找个事,但她怕自贬身价,失去了淑女的身份,从而使柳原更有了推卸婚姻的借口。最后,一座城市的沦陷成全了她,流苏的戏圆满收场,她和柳原握手的一刹那的谅解,便使她有着心满意足的能够和柳原“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的”希望。

《沉香屑·第一炉香》^[11]中的葛薇龙,是女性为了爱情而将自身毁灭的一个悲剧典型。她原是一个纯洁而有个性的女学生,为求学而客居在姑妈家。姑妈有钱、风流,为勾住那些只看中她钱财的男人,便让青春美貌的薇龙作为她的色饵。起初薇龙有她自己维护人格完整的标准和自信,然而现实摧毁了她的幻想,她一步步地退缩。司徒协的出现逼着她向乔琪的追求认输,而乔琪却只要她做情妇。由想念书到想嫁人,由想找一个理想伴侣到抓住乔琪这个可能的机会,由想结婚到情愿只做情人,又由情人到发现乔琪的不忠之后仍然嫁给他,畸形的爱情毁了她。为了得到爱,她不惜将自身卖于“交际”、自贱成“造钱”的交际花以取悦并不爱她的丈夫。

缘于对男性依附的女性悲剧比比皆是:《红玫瑰和白玫瑰》^[11]中的娇蕊,纯情地爱上自私、虚伪的振保,而毁掉自己的家庭;《半生缘》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男人达到一生有所依附的目的,竟然伙同丈夫干出伤天害理之事,毁了妹妹的幸福;《五四遗事》^[11]中的密斯范虽然冲破重重阻挠赢得了自主的婚姻,到头来依然没能逃脱为依附男人而形成的三妻四妾的局面。

同时,张爱玲也清醒地意识到,女性异化的根本原因是由女性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男权统治之下的境遇所造成的。的确,自从母权制被颠覆、父权制形成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开始,女人就

被限定在了社会的最底层,由女神变为女奴。在这种受压迫的环境中,女人渐渐养成了妾妇之道,处处依附,事事驯顺,女人依附于男人求生存的劣根性,是男权社会一手造成的。在历史短篇小说《霸王别姬》^[11]中,张爱玲把自己清醒的女性独立自主意识复活在古美人虞姬身上。她改写了代代沿袭的英雄美人模式,否定了传统的美人伴英雄或美人甘心为英雄殉情的女性生存价值,以惊世骇俗之笔把“霸王别姬”改写成了“姬别霸王”。张爱玲让这位古代美女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向为男人而活着,因男人的宝贵而宝贵的不独立的生存价值目标,作出了决绝的否定。于是虞姬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比较喜欢的收梢”,在项王突围之前拔刀自刎。通过对这决绝惨烈的“姬别霸王”的描写,张爱玲表达了对女性自我迷失的忧虑与反抗,她希望女性能重新唤起和发扬自主意识,真正获取女性独立的生存价值和婚姻幸福。

张爱玲通过众多作品,探幽发微地揭示和批判了中国女性骨子里依然深深浸润的奴性意识,指出正是这种自甘依附于男性,处处以男人为生活中心甚至全部世界的病弱心理和奴性性格,使女性自身成为了阻碍自己发展的内在原因。她提醒并希望女性尽快挣脱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男权传统樊笼,尽快结束非人、非女人的女奴心狱生活,成为自由自主的女性优美自在的存在。

四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的客观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她大胆地揭出女性的心理痼疾,并且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对女性进行自审,具备同代人所没有的眼光,这显示了她在精神上的难能可贵的自觉。她不是盲目乐观地追随丁玲等女作家所开拓的女性意识的空间,而是认为女性从心理上、精神上根本就没有自我解放,她们仍然生活在自己的心狱里,自甘为奴。女性依旧无法摆脱长期的男权社会所形成的一些亚文化群体特征,如局限于家庭、依赖男性、处于沉默失语的尴尬处境等。女性解放的主要障碍不是外部的壁垒,而是自己内心的积垢。如果没有对女性自身传统意识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没有对传统男权积垢的揭发,女性解放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是一种深刻而独特的女性内审意识。所以说,张爱玲

的女性创作主题,比其他女作家更为彻底、不遮掩,了自五四以来很多女作家共同创造的一个关于女性
也不自欺于表层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解构彻底解放的神话。

参考文献:

-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C]//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3]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4]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5]托娅.试记梁凤仪小说的女性意识[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5,(12).
- [6]于青.女奴时代的谢幕——张爱玲《传奇》的思想论[C]//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 [7]张爱玲.童言无忌[M]//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 [8]张爱玲.私语[M]//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 [9]乔以钢.论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1,(11).
- [10]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四卷本).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 [11]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四卷本)[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Attempt at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Zhang Ailing's Literary Creation

DAI Xiao-dong

(Chinese Department, Sichu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igong, Sichuan 643000, China)

Abstract: The early 1940s witnesses Zhang Ailing's shining in the literary worl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women writers in modern China. In her works there are striking images of women figures. She boldly exposes their unhealthy mentality, self-examines the female on a higher level and enriches and well develops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much publicize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Zhang Ailing; literary creation; female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唐 普]